第三章

日本炮制“回回国”的阴谋和各地回族民众的抗日活动

第一节　日本炮制“回回国”的阴谋

一、日本对华的“回教”政策

日本侵略中国，不仅依靠其军事力量的进攻，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毒计，挑拨中国民族内部的关系，破坏中华各民族的团结，以实现其各个击破，最后灭亡全中国的企图。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军政府”就是日本此阴谋的产物。

对于人口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日本人也有所企图。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以推行田中政策为目的，积极向西、南两线进展。日本人深知伊斯兰教在西亚、南洋与中国力量之强大，为其前进中的重大阻力，而这种力量是难以用武力征服的。于是日本在“回教”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极尽拉拢、分化、挑拨之能事。它们把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无论他们是在亚洲、欧洲、非洲，都包括为一个大民族的一种广泛的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的联盟，是要把全世界信奉伊斯

兰教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在宗教的基础上，人为地捏造成一个所谓“回教民族”，由此鼓动“泛回教运动”，企图把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置于其支配之下。①

早在明治（1868—1912）末年，日本黑龙会就派川村狂堂来华，并加入伊斯兰教，遍历中国28省，调查回民事务达30年之久，同时鼓动回民独立，企图造就回民政权；由日本浪人会派来中国的佐久间贞，化名左东山，于1923年在上海创办《回光》杂志。此刊“以倡导回民应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目标”。但这些主张受到上海清真董事会的极力反对，佐久间贞也不得不返回东京。日本黑龙会又派涛秀雄（化名马成龙）专赴西北及东北各省，从事“回教之独立运动”。他组织黑龙会于辽宁，并企图组织“大回回国”。他的阴谋虽未得逞，却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的支持及援助。

在黑龙会与浪人会的倡导下，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认为应将“回教”工作视为军事工作的一个方面，遂于1915年派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来华活动，以湖南及长江流域为中心，结交中国“回教”方面的朝野人士；同时又派田中逸平赴青岛，转往济南，与黄河下游一带的回族人士联系，以调查冀、鲁、豫一带回民的生活及思想动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于中国“回教”的调查，主要包括人口、教派、寺院、人物（主要是军事要人）及维吾尔、哈萨克、撒拉等族问题；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寇对企图控制“回教”的工作更加紧进行。他们派人潜入宁夏、甘肃、青海等地进行各种破坏抗战力量的活动，敌机也曾在宁夏掷下充满挑拨及威胁性的传单及文件。日寇还图谋对在西北举足轻重的“回教”军政要人施以各种煽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为其

① 参见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第105—108页，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阴谋“开道”。

随着东北伪组织的出现，日本加紧建立“回教”伪组织的活动。1932年，长春成立了“伊斯兰协会”。这是日本人在中国所成立的有关“回教”的第一个伪组织。1938年2月，日寇又利用个别甘心附逆、认贼作父的回奸，如马良、王瑞兰、刘金保、刘锦标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广设分会，宣称此组织的目的在加强“防共战线”，打倒国共两党，拥护“友邦”（指日本）“仗义兴师”，实现“中日共存共荣”。这一组织的一切活动完全在日本人指挥操纵之下，各分会均有日籍顾问。除此而外，还成立了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伪“广州回教协会”、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由原长春“伊斯兰协会”扩充更名而成）等组织，在北平又成立了伪“中国回教青年团”，以日本人为主监，下设伪“中国回教青年团指导员训练所”，培养回民青年“防共干部”，课程有“防共学”、日语等。

日本收容一些自各国流亡日本的“回教”人士及土耳其王子等，公然标榜自己是“回教”的保护者，并在东京建立一所清真寺，附设“回教圈研究会”。值得提及的是，日本人在清真寺落成典礼的庆祝会中，抬出了伪满傀儡溥仪的兄嫂溥光夫妻二人，主持对于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的招待，并授意溥光夫妻向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表示自己对回教的信仰。显然，这是要在所谓“溥光殿下也是虔诚的回教徒”的宣传之下来拉拢欺骗伊斯兰教群众。①

为了达到破坏各民族团结抗战的阴谋，日寇进行了一系列离间“回教”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十分了解中国统治者大汉族主义政策下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他们认

---

① 刘春：《日本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载于《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五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打印本）。

为这种矛盾和隔阂恰好可以成为他们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有力武器。他们宣称“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并故意做出“抑汉扬回”的姿态，在一些问题上对回民施以小恩小惠。如制发所谓的“特别通行证”给回民，以示“优待”；还拨款修复“年久失修”的北平牛街礼拜寺；凡回汉有讼事，无论回民是否有理，均直回民而屈非回民；当时在日本人所办的各种警察队、特务队、侦缉训练班、宪兵警察队、政治侦探队等组织中，诱惑大批蒙回及流落平津的边疆青年。为了制造民族矛盾，日本人有时令“回教”侦探抓一“非‘回教’人”回来，不加鞫讯，即严刑拷打，打完后再审问。若被抓者无罪，则予释放，释放时故意问：“汝家与‘回教’有仇乎？不然何以被诬捉也？”有时甚至将被“诬捉”者“冤抑至死”，还声言“此系‘回教’员警所举发，不能不办”。这种“回汉仇视政策”的结果，是造成“他民族对回教的绝大恶感”，成为“民族大仇杀之因素”。日本欲以此种手段“使回汉双方人口日趋消灭，逼使回民脱离母体”。①

除“回汉仇视政策”外，日本人还在绥远、包头一带实行“回蒙互杀政策”。绥远失陷后，日本炮制德王傀儡政权，军权则完全操纵于蒙奸李守信之手。李守信所率之伪蒙军三师，分驻于平绥路西段一带，于民间“估吃霸赊，奸淫掳掠，无所不至”，②而日本人对此则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对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亦置之不理。日本人这样做，一是使蒙伪军在地方上尽量搜刮，所有金钱财物，大约收尽，然后以一纸令文，令其缴呈日军部。人民有怨，怨归蒙伪军；二是使蒙伪军结怨于民，如机会成熟，一旦发令，将其军权褫夺，更有所借口，且可以之结好民心；三是使蒙伪军风纪日趋废弛，日军则整饬军纪，以加强日军的力量及

① ②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 年。

对人民的统治。对于同为其“笼络对象”的蒙回民族，日本人仍然采用了极为阴毒的分化、宰割手段。日本对蒙伪军下的指示是，如回民阻挠蒙伪军的“干涉或命令”时，准许蒙伪军“格杀勿论”；同时日军又发给回民以“特别保护证”，即回民若遇蒙伪军“不礼貌”时，可以“自由抗拒”，必要时可请求日宪兵协助，其因而被惨杀者则“予以厚恤”。在日本人的精心“导演”下，回民“日以被杀闻”。回民义愤填膺，群思报复，但苦于没有枪械，于是日军又发给回民“仅足报仇之用”的“新式枪械”。这样，日军策划的“蒙回仇杀”开始了：“当蒙军士兵三五经过时，往往被回民仇杀至死。于是蒙伪军更加紧追杀，回民亦加紧报复，循环不已”。仅仅三年，“已彼此互杀1000余人”。①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以伪善的面孔使用卑鄙无耻、恶毒至极的手段，妄图以离间、分化的阴谋各个击破中华各民族，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目的。

日寇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彻底抗战的中坚力量，深知国共合作的威力，也了解国内对日投降妥协分子与“反共分子”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国共合作。因此，他们设法拉拢“回教民族”参与“防共反共”的活动。如日寇所组织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推出了奴性十足的《回教》月刊，其编辑大纲声称：“对外主张中、日、满三国紧密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绝对拥护新政府，发扬亚洲文化，维护固有之宗教，对内联络本教教胞，提倡教育，设法解决本教教胞之疾苦。”在《回教》刊载的文章中，充满了“防共”的言论：“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我回教民族须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同图谋民族之发展，向堂堂正正的路上迈进。趁此时机，我回教民族团结一致与友邦日本成一个生死线，庶乎东亚安定而礼教不亡也。”“青年啊！赶快觉醒吧！现

①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

在我们回教的复兴，是受友邦提携，将灭宗教的共产党替我膺惩了。所以信赖友邦保护，这是我们要知道的”。①

面对这一股反动逆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团结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一致抗日的方针，最主要的一条，是启发并提高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对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包括在这些民族中广泛地进行抗日的宣传解释工作，广泛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回奸和顽固分子挑拨回汉关系，制造反共言论，破坏抗日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反对任何对日妥协投降的企图。上述政策，不仅在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切实执行，而且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大后方的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所接受，并成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各“回教”报刊的宣传重点。如《回教青年月刊》、《突崛》、《月华》、《回民言论》、《回教大众》等都强调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树立对待“回教”政策的目的，完全是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权，以达其分割、统治中国的野心，并揭露了日本挑拨回汉、回蒙关系，鼓吹“经济提携”及组织“回回国”的目的是为了分裂中国，最后灭亡中国，也灭亡“回教”。这些言论，在回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二、日本炮制“回回国”的阴谋及其破产

日本为了实现其在华的“回教”政策，曾企图在中国筹划、组建“回回国”。

由于“回回国”只是日本侵略者未能实现的幻想，这里揭露的只是这个阴谋的“初衷”及其破产的过程。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打算，他们企图在长城线外，将我统一之中国，分割成若干小的政权组织，以便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为此，他们策划组建了

①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

伪“满洲国”和伪“蒙古自治政府”。至于“回回国”，日本关东军在考虑其地域划分时，大致分为两派意见。

一派以酒井少将为代表。酒井少将曾任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及驻华大使馆武官。他主张自南疆塔里木河流域，直到祁连山以北，迤东至大夏河流域，经兰州以西，北沿一条山，直达贺兰山之东，包括河套全部，以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仅余蒙古之西二特别旗（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属于伪“蒙古自治政府”之管辖外，其余则划成所谓伪“回回国”。酒井认为，此一计划如成功，将来即以“反共”为目的训练回民，使其负“防共”之责。同时，该计划将配合日本的西进计划，利用回民为其先锋，并在实行计划之前，将对西北诸马氏将领的武力予以彻底打击，使其退出宁夏及青海，再用种种离间挑拨手段，使西北方面彼此猜疑，以便乘隙向上述地带进兵。

另一派为关东军之干部派。他们主张仅以现在的宁夏及绥西为伪“回回国”之地带，先行成立，然后逐渐扩展。贺兰山以西的蒙古二特别旗，仍属于“蒙疆”的统治范围，必要时予宁夏以彻底打击，使其不能自存。故计划对西北进兵之前，积极从事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

在伪“回回国”的地域内，日本计划尽量排斥非“回教”人入境，严加政治上的封锁，同时将所有“回教”人所有之企业，集中统制，然后使其失业，逼其或逃亡，或充当鹰犬；在政治上仿伪满、伪蒙旧制，拟设一傀儡，而实权则操纵于日本人之手。

为了准备西进，日本人派蒋辉若（清末曾任副将、统领等职，北洋政府时代，一度任张北守备军总指挥及骑兵司令）为伪“回军总司令”驻包头，并于1939年冬天进犯五原。关东军认为西北防务单薄，拟乘虚首先攻下五原，然后西进以实现其建立伪“回回国”的计划。然而，傅作义将军率二旅之众，奋死夺回五原，蒋

辉若仅以身免。日本组织“回回国”的“初梦”也因之幻灭。

日本在中国组建“回回国”的阴谋之所以未能实现，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回族等的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的伪善面孔掩饰不了它的法西斯本质。日寇的种种暴行，从反面教育了回族民众。由于穆斯林的特殊生活习惯，所受日寇的欺凌侮辱更加严重。在敌占区内的回民居住地，日寇把猪血猪油涂在清真寺墙上，把猪头悬挂在清真寺门口；在沧县捷地，日寇强迫清真寺的阿訇给他们杀猪，阿訇不从便被他们用刺刀挑死，日寇还故意在清真寺大殿内吃猪肉；济宁、德州等地日寇强迫回民杀猪慰劳日军，遭拒绝后便恼羞成怒，血洗回民区；沈阳、长春两地的日寇为扩建兵营将一万数千个回民坟墓掘发，骸骨暴露，惨不忍睹；日本在张家口等地开办回民女校，强迫大批回民少女入校学习，实际是强迫她们充当歌妓艺妓，供日本侵略者玩弄取乐。就是日本人搞的所谓的与回民的“合作”中，回民也是深受其害。如自北平至宁夏磴口间的运输事业，几全系用驼运，驼运商亦多为回民。然自日本人所谓的“运输组合”成立后，以汽车包运货物，运费低廉，交货迅捷，且损失也比驼运为少。不到半年，驼运业遂一蹶不振，以驼运为业的数千回民则难求生计。绥蒙一带的皮毛业，大部分为回民经营。他们收购西三盟及拉卜楞一带的皮毛，运往天津销售，同时购买湖北的砖茶。战前一块砖茶大约值羊皮一张。自日军侵入绥蒙后，将回民生计所资之皮毛业，用“统制”之名概行剥夺，并创设“大蒙公司”，集中所有皮毛业，凡回民自行买卖，均属犯罪。日本人强迫以砖茶一块换羊皮五张，若有大批贸易成交后，须迟到三五月后始行付款，有若干不愿出售之皮毛者，动辄用军事力量加以征收，付款不及十分之一。这样，过去从事皮毛业之回民，贫困潦倒，难得一饱。

具有光荣斗争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回族，没有为日本帝国

主义的引诱所动，也没有在屠刀下屈服，而是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战行列。在每个抗日的战线上，正规军与游击队中，以及一切抗日团体与抗日工作中，都有回族同胞为保卫祖国、争取民族生存而战。沦陷区清真寺的阿訇，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在礼拜以前，宣讲“圣谕”当中，引出《古兰经》所讲的话：“真主与我们白昼，亦与我们黑夜，我们不要着急，宁静着精神，不久便到黎明”，来安慰过着黑暗生活的教胞，启示着人民胜利已不远，正义的光辉快照临人间。一批回族的爱国刊物，从事唤起民众一致团结参加抗战及国际反日援华的工作，同日伪反动舆论和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总之，抗日战争期间，回族发扬富于团结富于斗争的光荣传统，同其他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第二节　各地回族民众的抗日武装

一、回族人民武装斗争的大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回族人民革命史上武装斗争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回族人民的武装组织遍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和陕甘宁边区等地。此外，还有许多没有打出回族旗帜而其成员绝大部分是由回民组成的抗日武装，以及分散参加在各抗日部队中的回民。这些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写下了现代史上回族革命的光辉篇章。

回族在抗日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所以发展壮大，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也与积极倡导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

密切相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回族遭受着封建王朝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欺辱与歧视。特别是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中，回族经受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统治时期，回族的处境也未得到改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承认回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把回族称作“具有特殊生活习惯的国民”，把回族同胞称为“回教徒”，回族由此被剥夺了享受民族平等、民族自主的权利。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歧视，引起回族人民的严重不满，曾多次进行反抗斗争，但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抗战全面爆发后，回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经受着更深重的灾难。回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回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回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不可分割。国破家亡的现实促使回族人民拿起武器投入保家卫国的抗战行列。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回族武装力量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一直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而且主张民族平等的原则，同时十分注意团结回族人民共同抗日。早在抗战前夕，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试图在西北寻找并建立抗日根据地，就看到了回族人民在抗战中的作用。为团结回族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坚决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对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极为尊重。1936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中指出：“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与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号召“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

贼”。[1] 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回民聚居区，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了党制定的对回族工作的政策，特别注意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赢得了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的伟大号召，接着再度提出“建立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和各个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党明确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2]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如冀鲁边、冀中、陕甘宁等根据地的回民聚居区，不但有群众性回民抗战组织，还建立起回民抗日民主政权。在边区各级“三三制”政权中，也有阿訇和各级人士参加，回民获得了民族平等和参政权利，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同国民党统治区压迫歧视回族人民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特别是在回民抗日武装组织中，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党的各级组织始终十分注意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即使在后来回民部队里补充了一部分汉族战士后，仍保持了回民的民族特色。由于坚持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回民武装成为回族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窗口。回族人民从大量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真心实意实行彻底抗战的政党，而且也是真心实意实现民族平等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回族和全国各民族解放事业的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战主张，积极组织力量参加抗战，使回族武装很快在各地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了冀中回民支队、渤海回民支队，以及在许多地方建立的回民大队、伊斯兰大队、回民骑兵团、回民主力连、回民基干大队、回民警卫连、回民游击队、回民营、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 7—1949. 9。
② 同上书。

清真大队等等，成为全民族抗战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冀中回民支队

在华北平原的腹地——冀中区，有一支著名的回族武装抗日组织，这就是“冀中回民支队”。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长的时间里，平津陷落，华北垂危。肩负民族存亡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命令八路军挥师华北，挺进敌后。1937 年 10 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 115 师的一个独立团和一个骑兵营，在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率领下留守五台，创立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后，吕正操奉党的指示，率领 53 军旧部两个营，在安国、任邱、河间、献县等地摧毁敌伪组织，成立了冀中政治主任公署，正式建立了冀中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

冀中的广大回族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各地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纷纷组织起来，并建立起不少抗日武装。其中有两支较大，且成立较早的回民武装，一支是由萧秉贵、刘文正等在定县、安国一带组织成立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另一支是由马本斋在献县一带组织成立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

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是在马本斋组织的回民抗日义勇军（一称回民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马本斋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回族贫苦农民家庭里。1937 年 8 月间，日寇占领了献县，这里的人民遭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马本斋挺身而出，号召家乡的回民同胞组织武装，准备反击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马本斋是行伍出身，在东北军当过军官，懂得一些军事知识。他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有一腔爱国热情，回民都愿意跟他干。这样，便在东辛庄清真寺树起了抗日的旗帜。

马本斋的抗日武装组织一成立，很快得到了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的支持。孟庆山是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尚未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他受党中央派遣，先期到河北来发动群众，并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很快组织起了河北游击军。马本斋的抗日队伍在孟庆山的帮助下，进一步扩大，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加入河北游击军，称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

1938年7月，冀中军区指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和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集中河间县城进行整编。整编后，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下设两个大队。马本斋任总队长，杨铁城为政治主任，不久晋察冀军区又选调回民干部、共产党员丁铁石任政治主任。在河间整编之后，加强了回民教导总队中党的建设工作，连队中普遍建立起来党支部，从而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年轻的民族抗日武装队伍。此时，马本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马本斋的话，说出了当时许多回族同胞的心声。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冀中区回民抗日群众组织——冀中回建会（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会）于8月18日在任邱县成立。冀中回建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冀中区范围内动员回族青年积极参军，并动员冀中广大回民群众用一切形式支援自己的武装，使回民教导总队的兵源、回族战士家属的优待工作有了保障。这对以回民教导总队为主体的冀中回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后方保障作用。

回民教导总队经过河间整编，战斗力大大加强。在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敌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五次战役围攻时，回民教导总队奉命转战在青（县）、沧（县）、交（河）一带，与八路军主力三纵队和贺龙、关向应所部八路军120师协同作战，紧

紧拖住日军山本联队于河间一带，并伺机突击，予敌重创。

1939年秋季，冀中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整军，根据斗争形势和军队建设需要，在各战斗团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这时，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遵照冀中军区指示，改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随后，冀中军区又派郭陆顺任支队政治委员。从此，这支回民武装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八路军的行列中。

回民支队建立之初最感困难的是武器，于是就动员老百姓提供了一批大抬杠（一种二人抬的大土炮）。这种大土炮打出去声如巨雷，烟雾滚滚，伏击敌人时齐发巨响，战士乘烟雾舞刀杀向敌人。1939年冬，回民支队曾用这种武器在无极、藁城公路上打击出外抢粮的千余敌人，歼敌300余人，毁敌汽车8辆，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并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

回民支队在与敌人进行战斗的过程中，使用了一系列灵活巧妙的战略战术，而马本斋更是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如康庄战斗。康庄是衡水至安家庄敌人据点之间的一个村庄。回民支队以少数兵力佯攻安家庄，待敌人打电话到衡水求援后，才迅速割断电话线，将我主力布置在康庄一带，静候衡水敌人出动增援。当毫无准备的敌人增援部队经过康庄时，遭到猛烈炮火的突然袭击。这场战斗除少数敌人逃跑外，其余的全部于半小时之内就被歼灭于衡安公路上。回民支队缴获加农炮一门，九二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步枪50余支，还有许多弹药。又如榆科战斗。榆科是敌人的又一个重要据点。为了拿下这个据点，回支队员化装成日本兵押着两个“被俘”的回支队员，被恭顺地迎进据点。这场战斗，回民支队17个勇士歼敌60余名，活捉30余名，还缴获许多武器弹药，顺利拿下据点。回民支队正是这样不断地在消灭敌人的战斗中壮大起来。

1940年，回民支队插入滦南。在滦南一带，当敌人进行大扫

荡时，回民支队在30里方圆之内坚持了52天的战斗。日军痛恨回民支队，一心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一次调动一万多兵力，配以300余辆汽车，合围回民支队驻地景县以北孙镇一带。回民支队则迅速转移到连城和高庄，采用巧妙的战术，避过汽车，集中火力猛袭步兵，歼敌300余名。

百团大战后期，敌人进一步增兵华北，冀中的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尤其是十分区，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敌人力图借机把这一地区变为“确保区”，于是增调兵力，广修公路、碉堡，使我抗日根据地大为缩小。此时，回民支队奉命挺进十分区，在大清河北坚持了六个月的对敌斗争，曾以“推磨战术”，绕容城一周，突破了敌人四个合击圈，而后转战于深泽、武强、饶阳、平安一带，在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后，又猛插青县、沧县、交河一带，先在南张白和东阳村袭击了敌快速部队，又主动出击，两次攻打景河，歼敌百余名。同时，在子牙河东北又先后五次伏击敌人，用地雷炸毁敌人汽车数十辆。接着，又在陈庄消灭敌常备兵300余名，打得敌山本联队不得不下令各据点“百人以下武装不得走出据点大门”。

回民支队引起敌人的恐惧。敌人企图以武力消灭回民支队，而回民支队反而扩大了；企图以挑拨回民的感情来瓦解回民支队，而回民支队与八路军团结得更紧密了。面对失败，敌人采取了更卑劣的手段来迫害回民爱戴的领袖马本斋。他们将马本斋的房产付之一炬，迫他全家分散，只得寄居亲族家。1941年8月27日，敌人又将马本斋的母亲抓起来，企图强迫马母给儿子写信劝降，被马母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万万不能”。这位英雄的母亲最后绝食而死。马母的行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使冀中的抗日军民为之感动，也更加深了马本斋对敌人的仇恨。他领导着回民支队更坚决、更顽强地打击敌人。

1942年初，敌开始部署对我冀中根据地的大扫荡，以重兵从四周向中心地带逐步压缩，冀中军分区子牙河东部首当其冲，形势非常紧张。军区又命回民支队东越子牙河坚持对敌斗争。1942年5月1日，敌开始了对冀中发动大规模扫荡。在予敌重创之后，我冀中主力部队相继向外转移，回民支队也于6月底开始撤离冀中，退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冀鲁边区，一个月后，又转到冀鲁豫根据地，归冀鲁豫军区第4分区指挥。9月27日，敌对冀鲁豫中心地区大举扫荡，为避敌锋芒，回民支队跳到鲁西北的3分区。3分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军区决定马本斋任该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1943年10月，鲁西北地区划归冀南抗日根据地，回民支队奉命调往鲁西南组成新3分区。

1943年7月，回民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盘踞在鲁西北朝城地区的伪31师展开全面攻击，摧毁据点80余处，俘伪军700余人。同年冬，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以濮阳县八公桥为中心向外扩张，蚕食我根据地。11月16日，在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下，回民支队和军区其他两个团对八公桥发动攻击，经12小时激战，全歼孙良诚的部队。八公桥战斗之后，我军迅速扩大战果，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扭转了冀鲁豫的战局。

1943年冬，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仍以数十万大军云集西北地区。为了增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防卫力量，以防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中央军委命令冀鲁豫军区部分主力开赴陕甘宁边区。1944年2月1日，回民支队同军区其他五个团一起西进，踏上了开赴陕北的征途。马本斋因病留在冀鲁豫后方医院，不幸于1944年2月7日逝世。

马本斋的逝世，是冀中回民武装的一大损失，也是回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追悼马本斋时指出：马本斋同志“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因为他

认识了“只有信赖共产党才能完成自己民族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毛泽东主席赠挽：“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副主席赠挽：“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总司令赠挽：“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①

1944年4月初，西进纵队到达陕北，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教导一旅，仍保留回民支队的番号，并于5月初进驻甘泉县王庄沟投入大生产运动。1945年9月2日，回民支队第一批赴东北解放区的干部90余人从陕北出发，随后又有两批干部分赴东北和冀中，其余的干部和部队编入教导一旅其他各团。至此，作为一支民族抗日武装，回民支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战，先后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敌人3.6万余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冀中军区曾通报各部队要“向回支看齐”，并奖给他们“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军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曾颁令嘉奖马本斋；吕正操司令员赋诗赞之“回支骁勇天下闻”。英雄的回民支队是回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史上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渤海回民支队

渤海回民支队，是抗日战争中回民武装的又一面光荣旗帜。

冀鲁边区东临渤海，西靠津浦铁路和运河，南邻济南，北接天津，是河北省东部和山东省北部的平原地带。这里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党组织的建立比较早，且有一批优秀的回汉族领导骨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冀鲁边区的回汉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第4集。

产党发出的“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号召，踊跃参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迅速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和津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津南、鲁北是回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冀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一支以回族为主体的抗日武装——回民抗日大队。当时，从津南抗日游击队和沧县县大队抽调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人员（以回族为主）为骨干，于乐陵县魏家庵村组成了这支新的回民抗日武装。1940 年 8 月 1 日，在孟村新县镇正式宣告冀鲁边军区回民大队成立。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到 1941 年秋，回民大队改编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1944 年，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这支回民武装也随之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刘震寰（回族）为支队长，王连芳（回族）为政委。

这支回民抗日武装开始组建时，冀鲁边区党委就明确它的基本任务有四项：第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回汉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第二，帮助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第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第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分化瓦解敌军，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消灭日本侵略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回民武装依靠和团结回汉族人民群众，战斗在津南鲁北广大地区，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拔掉了敌人许多据点，对扭转津南鲁北的抗战局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反对敌人大小扫荡的日子里，他们打了许多漂亮仗，如智取旧城、巧打姚庄的战斗等。

黄骅县旧城据点，地处盐山、黄骅两线的交通要道。驻在旧城的日伪军经常出外烧杀抢劫。回民武装决定拔除这个据点。1941年8月1日旧城集日的中午，由几名战士化装成担筐卖瓜的小贩混入敌人据点下，主力则在城外埋伏。正当敌人在集上横行霸道时，“卖瓜”的战士攻入据点，控制了敌人的高堡和宿舍。信号枪一响，在城外埋伏的部队迅速攻入，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毙敌5名、俘虏60余名，缴获长短枪50余支、掷弹筒1个。

相隔不到20天，回民支队的四名战士，又以智取胜，一举拿下了冀鲁边区交通要冲——于桥据点，俘敌30余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

姚庄位于孟村东部，深沟壁垒，戒备森严。回民支队通过当地地方组织，争取了驻在姚庄据点的一个伪军，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于1943年农历除夕，迅速攻入据点内，未费一枪一弹，拔掉了姚庄据点，俘敌100多人，并缴获了敌人全部武器设备。

1944年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好转，渤海回民支队主动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时而独立作战，时而和兄弟部队配合，活跃在津南鲁北广大地区。1944年1月，首战赵古庄子告捷，军心民心大振。接着拔掉小山、苏集、小白兔等据点。特别是花寨战斗，回民支队英勇杀敌，以少胜多，打得敌人死伤惨重，再不敢在这一带轻举妄动。

1945年春，渤海回民支队向敌人展开的第一个攻势，是配合军区部队解放以齐家坞、中望、李村为中心的黄骅县西北、沧县东北、青县以东的广大地区。回支首先拔掉了吕家桥据点，为解放齐家坞打开通道。这一仗俘敌200余人，缴获武器200多支，收编了伪军两个连。又以五天打三仗的战绩，威震浮河，歼灭了沧县伪自卫团3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之后，在军区统一指挥下，参加了盐山、无棣、小安城、惠民等许多大的战斗，最

后又攻克了韩村、歧口，在对日寇反攻作战中，越战越强。

渤海回民支队从 1940 年建立到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共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百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 40 多个，歼灭敌人 25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2600 余支、机枪几十挺、各种炮 20 多门。回民支队也由初建时的几十人发展到千余人，成为一支较有影响的人民武装军队。1945 年 9 月，这支部队由黄骅县挺进东北。

四、战斗在其他战场上的回民武装

在其他战场上，还有不少英勇战斗的回族武装。在陕甘宁边区的回民骑兵团是 1938 年至 1941 年在宁夏西海固地区三次回民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率领部分起义军冲破重围，奔赴陕甘宁边区以后成立的。党组织十分关怀这支回民武装部队，先后派了卫一吾、杨静仁、周维俊、马克、何仲发等同志到骑兵团工作，并送马思义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回民骑兵团在保卫边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在西北回民地区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支宣传队，为团结回汉族群众共同抗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河北，冀中回民支队调离冀中后，留下一个连坚持斗争，又发展成一个伊斯兰支队，后来在献县、河间一带与当地一部分回民武装合并，建立了八分区回民支队，有七八百人。1945 年定县回民中队发展成七分区回民支队，有四五百人。1943 年任丘、肃宁、文安一带建立回民中队，1945 年发展成九分区回民支队。雄县、霸县、武清、永清成立了十分区回民支队。1941 年香河一带有冀东回民大队，经多次扩大，成为回民支队。山西壶关有回民游击队，长治有回民营。山东鲁中地区、泰运军分区组织了回民主力连和回民基干大队。在沂水、沂源成立了回民警卫连。在东平、定陶沙海、菏泽马垓、沂南大成庄等回民村庄，还建立了回民抗日游

击队。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人民的抗日武装大小数十支。这些武装力量在人民的支持下，以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爱国热诚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如沂水县伊光大队，是保护18集团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兵工厂的回民警卫部队，在保卫兵工厂和反扫荡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鲁西北的朝城、馆陶、临清、冠县一带成立的回民大队、中队都在坚持抗日发动群众开展战争，进行过无数次战斗。后来，经过整编，许多回族青年分别参加到冀中回民支队和冀鲁回民支队。冀东回民大队由十几个人发展到近百人。他们常年转战于平津之间，在残酷的环境下，配合主力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日寇千方百计消灭他们，多次派兵围剿，但都未能得逞。有一次敌人派出1000人将其包围，被围的70余名战士沉着应战，坚守一天一夜，毙敌130多人，然后乘夜突围，仅有一个轻伤。

安徽省定远县二龙乡的回民，随着新四军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就建立了地方游击队。1943年扩编为清真营（后改为清真大队），约250人，下属清真一、二两个连。三年中他们活动于周围数十里，与敌作战百余次，对打击敌人骚扰，保卫群众生命财产，拦截支敌物资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山东泰西地区，以米英俊为连长的回民连深深扎根于当地回、汉族群众之中，机动灵活，骁勇善战，打得日寇心惊胆寒。出身回族武术世家、战前曾获得山东省武术比赛第一名的米英俊，视民族兴亡为己任，辞去教职，投笔从戎，坚决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在党组织的指引下，他组织起三四十人的回民抗日游击小组，使用土枪土炮打击敌人，在斗争中迅速发展成为泰肥独立团领导下的一个回民连队。1941年春，回民连在冀鲁豫军区经过整训后回到泰西，随即投入反蚕食斗争。七月，在攻打东平仓邱镇的战斗中米英俊率领连队担负正面主攻任务，为我军攻克仓邱镇，全歼守敌立下了奇功，被军区

授予“夜老虎连”的光荣称号。1942年，回民连在军分区一团的指挥下，驰骋鲁西，频繁战斗，连克多处日寇据点。在历次战斗中，米英俊都是冲锋在前，以无畏忘我的英雄气概和精湛的武功，机智的指挥艺术，率领和鼓舞战士们顽强战斗。1943年7月，米英俊被调到家乡肥城县任县大队副大队长，同年10月在一次反扫荡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6岁。为继承和发扬烈士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经军区批准正式组建了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回族武装。

除了回族武装组织外，在其他抗日武装中，有无数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为祖国的利益流血牺牲。如全国闻名的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回族），抗战初期曾任苏鲁豫皖边区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教导员，后被派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他努力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并率领游击队在津浦沿线神出鬼没，奇袭突击，使敌人的军事运输常被破坏。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山西代县人民自卫队队长回族小英雄金方昌，17岁就和雁北人民一起与日寇作顽强斗争，后不幸被捕。被捕后遭受酷刑，但他宁死不屈。野蛮的敌人挖去他的眼睛，他就用眼血在牢房的墙上写下14个大字：“严刑利诱奈我何，颌首流泪非丈夫！”他的事迹至今还在雁门关内外人民中流传。

武装抗日的风暴锻炼了回族人民，更使其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家、民族的危难关头，回族的民族意识得到了新的升华，他们和中华各民族一道冲上挽救国难的前锋。这种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在回民武装组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所有的回民部队中几乎都有汉族指战员，有的部队有时还是汉族战士占多数。他们和回民指战员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战斗，共同生活，亲如兄弟。汉族人民也像热爱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热爱回民部队。这种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不仅

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而且为根本改变历史上的回汉隔阂，建立新的民族团结友爱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雄的回民武装，把英雄的回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日决心集中地反映出来，而这种热情和决心又是回族武装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有力保障。如河北盐山塔上村刘黑连爷多次掩护回支战士，有一次被敌人打得鼻口流血，几次死去活来，但他丝毫没有暴露回支的行踪。1941 年，敌人扫荡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回民村庄时，集合 200 多名未及隐藏的回民妇孺到一口大井边，追问回民部队的活动情况。但任凭敌人施尽暴行，始终无一人屈服，最后全部被迫投井牺牲。又一次日军包围了河北大厂田庄，集合村中回民盘查回支战士，当时虽有战士隐于村内洞中，但无一人说出，当时有八名回族妇女被日寇用枪刺死。回族人民坚决抗日的英雄形象和英雄的回族抗日武装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第三节　回族人民的爱国救亡活动

一、回族报刊的爱国宣传

爱国宣传是抗日战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条战线上，回族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出版《回教大众》、《月华》、《回教青年月刊》、《伊光》、《绿旗》、《突崛》、《清真铎报》、《成师校刊》、《回教青年会刊》（香港）、《回民言论》（后改名《回教论坛》）、《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后改名《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等爱国刊物，从事唤起民众一致团结参加抗战及国际反日援华的工作。

这些回族刊物，有的是应抗日形势需要而新办的，如《绿旗》、《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等；也有的是在七·七事变前就已经开办的。从战前开办的几家刊物来看，它们的背景、宗旨和政治倾向原先相差很远，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纯宗教刊物，几乎不涉及社会问题，如《伊光》；第二类为纯学术刊物，如《月华》为当时国内探讨伊斯兰学术文化的重要论坛，《清真铎报》为云南著名的伊斯兰研究阵地，《成师校刊》则是北平成达师范校内通讯，三刊都几乎不刊载政论文章；第三类是以刊登宗教和学术文章为主兼刊政论文章的刊物，如1933年由南京国民党中国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后改蒙藏学校）的回民学生创办的《突崛》，其发刊词曾对刊名作过解释："吾中华民族宜如何突破此危机，开展新生命，以崛兴于此险象环生之境遇中"。其宗旨为"唤醒中国回民，阐明回教教义，倡导回民教育，联络回教民族"；第四类是以发表政论为主兼刊学术文章的刊物，明显倾向于传播当局观点，如《回教青年月报》，其宗旨为"阐扬三民主义，宣传中央德意，沟通回汉情感，传递边地消息，发扬回教真理，灌输回民意识"。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上述各家刊物都毅然改弦更张，一致将抗战救国宣传置于首位。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七·七事变后新创办的刊物中，虽然他们的办刊宗旨不同，政治色彩不一，如《回教大众》侧重于文化研究，《回民言论》偏向于政治鼓动，但宣传抗日救国，却成为各家刊物首要的共同信条。

在抗日战争的严酷考验面前，各种回族刊物纷纷从原先不同的政治立场转换角度，在抗战爱国的大方向上取得一致，这是中国回族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也是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自身解放道路迈出的重要一步。促成转变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看，大后方的各界回族人士，包括政治上右倾的上层人物，在面临强敌入境，国家陷于生死存亡之际，

都能通晓民族大义，顾全抗战大局；从客观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推动全国各民族抗战，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过去个别回族刊物上对共产党的不实之词几乎绝迹，所有的回族刊物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有了共同的认识，对国内各民族、各政党、各阶层的团结也普遍予以重视或尊重。

综观抗战时期回族报刊的爱国活动，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痛感山河破碎，唤醒同胞救亡。回族报刊进行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不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才开始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由于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日本侵略者的进攻目标不但指向华北，还企图囊括绥远、山西、山东，而且认为吞并整个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面对亡国的危机，北平宣内回回营民铎中学抗日救国会即创办了《醒民》杂志，先后发表了《抗日的决心及觉悟》、《失东三省的责任哪个顶》、《不抵抗主义和亡国主义》、《谈一谈南京惨死的学生》等一系列抗日爱国、反对国民党当局屈辱退让的檄文。同时，在回族文化界颇有声望的《月华》杂志于1932年1月25日第4卷7期发表了《国难期间伊斯兰应有的呼声》。文章写道："中国自东北事变以来，已至国人存亡立决之时。我们为伸张正义，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能不协力灭此惨害人类的倭奴。倭奴灭，则东亚和平可望，世界和平可望"。"在中国现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我男女教友，都应持一种勇敢奋起的精神，为爱正义、爱国家、爱宗教而从事于援救国难的工作。至于办法，如抵制日货、筹集款项，军事训练。我伊斯兰人应及早起来挽救这大好的东亚土地，保护中华古国的荣光"。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野心，更加引起回族有识之士的警觉。如1935年12月在南京晓庄出版的《突崛》第11

至12期合刊《突崛论坛》上，登载一篇《敬告华北回族同胞》的文章，指出“自塘沽协定后，华北局势即已转变，荆棘载道，疮痍遍呈，奸人为祸，傀儡作祟”，呼吁“华北教胞，亟应辨真敌人之面目，努力于环境之对抗”，“宜有牺牲精神”，“效命于国家尽忠于宗教”。1937年4月出版的《突崛》第3至4期合刊登载了《日本侵略新疆之透视》一文，揭露日寇觊觎我国边疆的狼子野心。1937年初在南京出版的《晨熹》第3卷1期上，也刊载了《由绥远抗战谈到回教徒之救亡责任》、《国难严重期中回教徒应有的认识》等爱国鼓动文章。七·七事变后，回族报刊更是把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唤起同胞投身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放在首要位置。如《突崛》杂志在卢沟桥事变当日在南京出版的第4卷7期中，就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从九·一八谈到卢沟桥事变的重要性》、《告回族青年》等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作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并出版战时特刊，一面刊载各地回族抗敌消息，一面刊载多篇论述文章，如《四月来抗战之教训》、《我们必须抗战到底》、《全民族抗战，怒吼吧中国》、《在第二期抗战中争取最后胜利》、《日本必败论》、《抗战期中突崛应负之使命》。1938年4月，《月华》由北平迁往桂林后复刊，在第10卷1期的复刊词中声明，今后第一件工作是“唤起教胞作具体的抗战工作”。在以后陆续发表的文章中，该刊始终贯彻了一条发表文字的立论原则，即：激励回民之国民气节，发扬回教杀身成仁之抗战美德，说明抗战建国必能成功之理由，联络回教世界，俾得国际上之同情，而予侵略者以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和《月华》情况类似的《成师校刊》在桂林复刊后，在其复刊词中，叙述了全校师生分两路撤离北平，然后流亡到广西的辛酸历程，而后在《编后记》中表示：“在抗战的当中，一切都为抗战而服务”。从复刊开始，《成师校刊》几乎每

期必登抗敌文章。此外，在内地新创办的回族刊物中，也充满一股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如战争初期在武汉创办的《回教大众》，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称："在这个全面抗战，也就是全民抗战的今天"，"我们要使得更广大的回教大众都踊跃动员，让他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献身民族，同时唤起世界回教大众对我们的同情和援助，所以我们办一个回教刊物大声呼号。这是我们发行本刊的第一意义"。

第二，揭露日寇阴谋，主张团结抗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挑拨中华各民族团结、制造"回教"民族同其他民族矛盾的阴谋，回族报刊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回教大众》第1卷2期刊载的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暴日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处心积虑，已非一日，他的方法，是制定以华制华的政策，用尽种种阴谋，挑拨我们国家的内乱，离间分化我整个民族的团结"，"假借回民名义"，"实施其侵略的计划"。《突崛》第4卷11期刊载了《从傀儡马良说起》一文，指出："马良是回族的耻辱"，"我们还得防备马良第二者出现"，警惕那些拿"回族做幌子而私营自肥自饱的人"。在《月华》第10卷18期刊载一篇题为《东京礼拜寺的真相》的译文中，指出日本"本无一真正信奉回教之人，所有者乃是住日之印度商人，和流落于该国之白俄，今因此一小小礼拜寺竟如此大事宣传，实属利用回教之一种卑劣无耻手段"。在该刊25期至27期合刊上，又刊登了陶行知在成达师范所作的题为《民族团结与全民抗战》的讲演。陶先生引用中国留学埃及学生的话说："日本修筑一个礼拜寺，向世界上回教国家说：日本注重回教。我们的同学用广播向世界各国揭破日本的阴谋"；"日本造了两座清真寺，然而在中国不知焚毁了多少清真寺，杀害多少回族同胞"。当时《回民言论》第1卷8期刊载了《暴日利用回教阴谋的一斑》，第3卷10期登了《严防敌人在近东的新阴谋》。

《回教青年月报》和《突崛》都连续转载了杨敬之为《大公报》撰写的《日本回教政策之全貌》，比较系统地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树立对待“回教”政策之目的，完全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权，以达其分割、统治中国之野心，然后揭露了其挑拨回蒙互杀，鼓吹“经济提携”之真相及组织“回回国”的企图。在揭露日寇阴谋的同时，回族报刊还积极宣传团结抗战，号召回族同胞莫为敌人的阴谋所动。如上海的《绿旗》杂志第1卷2期《告上海回教青年》一文谆谆告诫道：“坚定信仰”，“加紧工作”，“以贞节自矢。处此穷促之时，切不可为横来金钱所诱惑，为浮云之虚荣所鼓动”，“孟子天降大任一章，与文天祥之正气歌，可视为吾回教青年之金科玉律”。《中国回教救国学会会报》第5卷5至8期发表了《日本的回教政策与中国回民》一文，指出“日本小鬼虽想尽方法对于内地回民勾结、分化、离间，……但是内地回民意志坚定，操守贞固，无所施其伎俩。”《回教大众》第1卷3期由沙蕾撰写的《保卫西北与协和回汉》的社论中强调：“‘协和回汉’的工作，在保卫西北的题目下，实具着和增加军队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更含重要性。”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继续发展，许多回族爱国人士在进行反侵略宣传的同时，则进一步开始考虑回回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路问题。他们认识到，回回民族的斗争方向，首先应该是与中华各民族坚持团结，坚持抗日自卫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次，也应该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争取解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改善回族内部关系。因此，许多回族人士热衷于在报刊上宣传回族在抗战中的倡新运动，即：“一、扫除回、汉隔阂；二、消灭教内派别；三、努力回民教育；四、抗战救国；五、阐扬回教真谛”。① 一时间，在各种回族刊物上，除继续刊登抗敌斗

① 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93页，延安，1941年出版。

争消息外，又逐渐增添了不少议论回汉关系，研究回民教育，调查伊斯兰教派，探讨回族学术文化的文章。如香港《青年会刊》第3期刊载了《抗战声中普及回民教育谈》，《成师校刊》第5卷1期刊载了《抗战建国与发展回民教育》、《回教与社会问题》，第5卷11至12期合刊登了《回教教育在抗战建国时期中的师资问题》，《月华》第10卷7期上刊登了《回教文化运动与抗战救国》，《突崛》第6卷12期上刊登了《回汉合作谭》，《回教青年月报》在第4卷4至5期合刊、第5卷3至4期合刊和第5期上先后刊登了西北伊斯兰教派的调查资料，《突崛》第7卷6期上连载了《中国清真寺寺址调查表》等，其目的在于加强回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同时也加强回族自身的团结，共同从事于抗战救国事业，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除进行以上内容的爱国宣传外，当时回族报刊还竞相报道国内外“回教”的抗日新闻。如《回民言论》专设“半月论坛”，介绍及评述半月内大事；《月华》辟有“伊斯兰消息”专栏，《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也设有“国内回教消息”和“国外回教消息”及“分支会活动情形”三个专栏，《突崛》辟有“穆斯林瞭望台”专栏。此外，这些报刊还考虑到回族人民的宗教感情，普遍注意把宣传抗战救国与宣传伊斯兰教义相结合。如《成师校刊》在每期的头页都刊登一段有针对性的《古兰经》译解；《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也在每期篇首刊首刊用一段由张秉铎翻译的《古兰经训》，其创刊号用的是“血篇”，译文指出：“我们服膺正义与真理的人，绝不能与违背正义与真理的人妥协，我们要用刚果的决心，英毅的魄力，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一切魔障”。

由于战时形势所迫，几乎每家回族刊物都曾遇到过经费、纸张印刷及发行方面的众多困难，有的刊物被迫几次迁址，不少刊物被迫中途辍止。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动摇办刊人的决心。一篇篇

抗日救国檄文和振奋人心的消息，通过这些报刊发往全国各地，在回族人民中传阅，它激励了回族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了回族人民的抗日斗志。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人民所以能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是与回族报刊的爱国宣传分不开的。①

二、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和影响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遍布全国的各种救亡斗争，同敌后战场回民抗日武装斗争一起，形成了全民族参加抗战的生动画面。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地区的回民迅速组织起“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并于7月29日发表了《卢沟桥事变的通电》，表示“鉴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后援会同北平学联、民先队及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抗日团体一起，深入大街小巷，进行抗日宣传，并共同发起成立了义捐团、慰问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精神捐资购买食品、衣物、用具，送往前方慰劳战士，表达了北平回民抗击日寇的决心和高度的爱国热情。

日寇进攻包绥时，包头回民迅速组成“西北回民救国会”，并发表了强烈谴责日寇侵占包头、绥远的《告西北回民书》，呼吁西北回民立即行动起来，“踊跃输将，自动捐助”，“来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亡”。包绥失陷后，有来自甘肃和宁夏的回民骑兵武装，为阻止日寇西进和南下，奋起在绥西坚持抗日，西北回民救国会通电全国，高度赞扬他们忠勇杀敌精神，并将各地回民的募捐，不

① 以上内容参考余振贵：《论抗战时期回族报刊的爱国宣传活动》，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断“汇交绥远军民联合委员会，收转前方将士，以便慰劳之”。[①]

1938年初，日寇为了阻止回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唆使回奸马良、刘锦标等少数民族败类在北平组织了所谓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各地回民纷纷通电声讨，宣布开除马良等人的“教籍”，并另行筹建全国性回民抗日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这年2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宣布成立，在该会的宣言中指出：“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并提出要发扬回民“勇于牺牲，坚于团结”的精神，与日寇奋战到底，“在教为教中基础，在国为国家干城”。为激励回民大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该会还谱写了一支《中国穆斯林抗敌曲》战歌：“起来吧！中国的穆斯林。举起我们的宝剑，发出我们的吼声，贯彻爱国的品德，负起保族的使命，认清我们的敌人日本。它施放无情的炮火，它残杀我国的国民，要把中华一口并吞。我们决不受他的侵凌。穆斯林！前进！前进！”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成立后，各地纷纷成立分会。这些组织在抗战期间，在组织各地回族民众救亡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祖国的西北，回族人民是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1938年2月，甘肃回民迅速建立了抗日团体“甘肃回民救国协会”，并连续发表通告，号召广大回族同胞积极行动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甘肃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兰州为中心深入各地。当时还在兰州中学读书的杨静仁等一些热血青年，利用原有学术团体“伊斯兰学会”的形式，迅速组织起来，成为兰州回族青年抗日救亡的爱国

---

① 《包头日报》，中华民国26年11月27日。

组织。他们在兰州大中学校的回族师生中发展会员，通过举行座谈会、办壁报、发传单及深入回民聚居的各坊演讲等形式，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寒暑假中，学会成员组成各种宣传队、宣讲团前往回民聚居的临夏、固原等地，通过办夜校、讲时事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使抗日爱国思想在这大后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西北重镇西安，也是回民较多的一个城市。1938 年 1 月 28 日，是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西安市各界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抗日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去的国土。其中有许多回族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他们表示“本市回民愿作政府后盾，卫国御侮”。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陕西分会成立后，不断选送回族知识青年前往西安、兰州等地军事学校和机关受训，以培养抗战人才。1938 年 9 月 13 日，陕西回协召开了约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抗战“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向各界发出坚决抵抗日寇的通电外，还一致提出了“通电全世界回教徒共同声讨暴日”、“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等提案的《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这里的回族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七·七事变后，在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主张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回族青年纷纷奔赴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延安的中央党校举办了专门的回民班，还有不少回族青年分别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及定边的民族学院学习和深造。这些回族青年毕业后，都成为抗日救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此外，1940 年 2 月，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成立，接着发表了《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呼吁“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

谋”，并发起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同年10月7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暨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协陕甘宁边区分会的成立，加强了对国统区重庆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统战工作，扩大了边区回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推动了西北回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

此外，在四川、云南、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省的回民也纷纷组织了抗日救国协会、抗战建国联合会、抗敌后援会、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回民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并在组织发动回民群众支援前线、支援回族武装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如1940年后，我华北、华中各铁路沿线被日寇占领，抗战区物资紧缺。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回民素有经商特点，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抗战区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出了力；又如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冀中区范围内动员回族青年积极参军，并动员广大回民群众利用一切形式支援自己的武装，使回民武装部队的兵源、回族战士家属的优待工作有了保障，这对于冀中回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后方保障作用。

声讨被日寇收买和豢养的汉奸、卖国贼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起来声讨。各地回民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斥责汪逆分裂叛国罪行。1939年2月2日，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河南省回教青年救国会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回族），主张明令通缉汪逆。白崇禧在复电中说：“抗战到底，为我国既定国策，决非少数奸宄所能动摇……愿我回胞，再接再厉，奋斗不懈，以争取最后

胜利”。

广大的回族人民，在抗战救亡的浪潮中，在广泛组织动员，积极支援抗战的同时，还同敌寇展开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斗争。

1938年2月，山东济南数百名日寇出动，到附近的农村烧杀抢掠。当他们来到回民村时，对那里的回民肆意侮辱，并勒逼他们杀猪慰劳。这种伤害民族尊严的行径激怒了当地回民，他们团结一致，对日寇的野蛮无耻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杀死敌寇200多名。重庆《新华日报》对这次回民的斗争发了专电报道，并写短评指出，“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是中华优秀儿女，是抗战中一支潜伏着的伟大力量”。

北平阜成门外有块回民公共墓地。日寇准备修筑一条横穿此公墓的公路，而且已派测绘人员闯入墓地进行测量。回民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很快聚集数百人，将测量人员驱逐出墓地，并连日在牛街清真寺等处集会，宣言“誓以北平17万回民生命，保卫五百年祖宗坟墓，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在这些勇敢坚强的回族人民面前，日寇无计可施，只好让步。

日寇为了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以各种方法对占领区的人民加紧搜刮。在华北占领区，日本占领者对回民实行所谓“徽章捐”，即将回民各户分为四等，各发徽章一枚。接到甲级徽章的，每年交纳3000元以上的“捐款”；接到乙级徽章的，交纳2000元以上的“捐款”；接到丙级徽章的，交纳1000元以上“捐款”；接到丁级徽章的，交纳500元以上的“捐款”。除此以外，还有所谓“飞机捐”以及“献金运动”（每家一元）等等，都遭到回民群众的严正拒绝。

面对华北回民抗日武装的纷纷建立及对日伪的打击，敌寇策划募集“回教军”，准备以“剿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教大队”，实行其“以回制回”的政策，这一阴谋当即遭到敌占区回民的揭露

和坚决反对。敌寇后来又搞了一个集体移民“满洲”的阴谋计划，准备每年移民一千至五千户，而且强令华北占领区的回民“承认情愿移民满洲”。在广大回族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敌人这一企图终未实现。

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敌后不仅展开各种形式的战地服务和救亡宣传活动，而且伺机直接打击敌人。1940 年 12 月 4 日晚，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十名团员在开封南关与敌军巡逻哨兵相遇，团员们当场毙敌三名，余敌仓皇溃逃；1941 年 1 月 6 日早晨，在汴新路夸武境列车庄一列由徐州开往彰德的兵车，被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十余名团员设伏爆炸，毁三节，倾一节，炸死敌寇 90 余名，伤数十人。

抗日战争时期遍布全国的回民抗日救亡活动，与各地回民抗日武装斗争一起，构成了回族全民族参加抗战的雄壮局面。

三、回族人士的爱国外交活动

回族人士爱国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中东和东南亚两个地区，包括南亚的印度（印巴未分治前）。在 1937 年 12 月至 1940 年末的三年左右时间内，先后有达浦生教长，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艾沙、马赋良两人小组，西北回胞朝觐团，留埃及学生朝觐团等个人和团体出访，而影响较大的则数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出访人员中，虽然绝大部分是回族，但也有艾沙等维吾尔族人士。所以这些外交宣传活动，不仅符合回族人民的愿望，也代表了全国各民族穆斯林的抗日愿望。

抗战时期回族人士爱国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特别是残害回族人民的罪恶公之于世，撕破日寇“尊崇回教”的伪善面目，揭露日本觊觎中东和东南亚的野心，挫败日寇对中国的外交包围，呼吁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

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扩张政策，勾结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称霸亚洲的国际阴谋，特别是要唤起世界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一）达浦生教长出访中东、南亚

达浦生教长是我国著名回族教育家，曾遍游南洋、印度各埠，在经商同时，与各地伊斯兰学者讲经论道，眼界大为开阔，回国后参与创建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及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任校长。抗战爆发后，他联络回族士绅，积极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接济受难教胞。这一时期，他多次收到海外友人来函，表示对中日战争的真相不甚明了，甚至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理应相互亲善，不该兵戎相见，还有人竟以为中日之间强弱悬殊，中国的抵抗是无济于事的。当时，学校送往国外的留学生也来信讲述日寇在中东诸国展开颠倒是非的反华宣传，致使不少中东人士对我国抗战产生错误观念。达浦生听到这种情况后非常气愤，当时就萌发了出国揭露日本在华的种种暴行，宣传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爱国活动的想法，只因救济回族难民等工作难以分身。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伊斯兰师范学校与城内四座清真寺、两所回教女校都被日寇占据，达浦生更是悲愤交集，发誓“上海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回去”，决心抛弃一切牵挂，于年末乘轮船前往埃及。

1938年元月，达浦生抵达埃及。时值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举行婚礼，达浦生就趁各国穆斯林贵宾纷纷来开罗庆贺之机，向他们积极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他在与国王会见时，于表示热忱之后，将日本法西斯的兽行及我国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向国王作了系统的阐述，当即获得法鲁克国王的深切同情。

不久，达浦生又奔赴麦加，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人士相聚，两次拜见了沙特国王，向国王及大臣们介绍中日问题真相，并要求沙特阿拉伯抵制日货。结果国王给予了很圆满的答复。此后，达

浦生重返埃及，用阿拉伯文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详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1938年5月该书刚脱稿，就为开罗各报广为介绍，埃及群众也纷纷购买。这本书后来加印了5000本，分别赠送给阿拉伯各国政府要人和报刊。

结束了在埃及的宣传活动以后，达浦生又去印度开展工作，受到当地穆斯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印度教徒的同情。印度人民本来对援华工作就很热心，派出一批医疗队员直接为中国抗战前线的将士服务。同时，又将中印两国国旗合制为一，举行募款义售，共征得捐款30余万元，准备购买救护车赠给我国。访印期间，达浦生和后来成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进行了长谈，并赠给他《告世界回教同胞书》。真纳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表示钦佩，并答应将该书译成印地语让印度人民得以了解，同时，为中国继续募集救济款项，提出将组织团体到中国慰问。

离印后，达浦生又在东南亚主要的华人居住区进行了抗日宣传，于1938年8月返回国内。

（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中东、南亚八国

1938年1月，由王曾善为团长，以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等一行五人组成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于同年2月抵达麦加，借各国穆斯林朝觐之际，和前来的达浦生一起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拜见了沙特国王。国王专门询问了该团的使命并表示赞赏："中国之坚韧抗战，颇予阿拉伯人以极度兴奋"，"爱国御侮，实为回教人民的天职"。沙特的财政大臣阿卜杜拉·苏莱曼在接见代表团时，表示沙特应与中国建立政治关系，并希望中国货物可多多运来销售，因为沙特工业不发达，只能销售日货，有了中国货，抵制日货更有效。

沙特之行结束后，代表团前往埃及。他们在该国拜访了首相马贸木德帕沙、世界回教青年会会长哈密得萨、爱资哈尔大学校长麦拉、埃及妇女协会会长沙拉威夫人等，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欢迎。此外，代表团还分别出席了世界反侵略大会埃及分会会议及亚历山大中国救亡会宣传大会。之后，代表团又访问了贝鲁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分别拜谒了各国元首及朝野人士，也同样受到深切同情和慰勉。接着，访问团抵达印度，受到印度各地穆斯林及真纳的热诚接待。代表们在印度历访拉哈尔、加尔各答、拉克诺等城市，接着又乘船西去土耳其开展宣传活动，后于1939年1月返回重庆。

据统计，近东访问团先后访问了八个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国家，还在巴勒斯坦的海法港临时登陆宣传，行程近5万公里。除拜见各国政府当局要人外，还接触了许多名流及重要党派团体，并多次出席欢迎大会、宴会、茶话会及发表公开演讲，还以阿、土、英三种文字编写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广为散发，并在国外报刊如《孟买新闻》、《伊拉克泰晤士报》、《印度星报》、《伊朗日报》、《贝鲁特日报》、《埃及邮报》等上面发表文章，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艾沙、马赋良出访中东九国

1939年10月，维吾尔族人士艾沙偕同新疆回族人士马赋良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名义，组团前往中东诸国进行外交联络。行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托他们携带《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前往海外散发。

艾沙一行首先抵达印度，会见了真纳等人，然后又与甘地等国大党领袖进行会谈。印度各大报纸都转载了他们带去的传单。然后，陆续前往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德里、虎克诺等地组织宣传。出访团还拜会了印度诗坛泰斗泰戈尔。泰戈尔表示：“中国是

文明古国，是很伟大的，日本绝不足以征服中国。在亚洲，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最密切，痛痒相关，我绝不希望我的兄弟打败仗，更不愿意日本打胜仗。你们替我转达前方的英勇战士，叫他们千万不要打败仗，那不只是中国的损失，而且是印度的损失。不只是印度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爱好和平人类的损失。中国的胜利，就是全亚洲人的胜利，全世界的胜利”。

尔后，艾沙一行转赴麦加，正值本年度的朝觐之际，他们在那里与留埃学生朝觐团相聚，同日伪派出的华北回教朝觐团展开斗争，旋即从埃及抵达土耳其，会晤了该国总理、外长、议长等朝野要人，并受到伊斯梅尔总统的接见。伊斯梅尔总统表示：“以中国之大，全民之团结，日寇必被扫荡，中国之复兴，绝无问题。中土两国分居亚洲之两端，实在有进一步往来之必要。”到次年年末，土耳其派出的第一任驻华公使席拔希即抵达重庆就职。

之后，他们又先后访问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叙利亚的报纸在他们进行宣传后，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呼吁：“叙利亚穆斯林应随时勿忘日本飞机轰炸下的中国兄弟，对日本应作有效制裁”。

最后，艾沙、马赋良重访印度西北各省，然后自印度返回。

（四）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赴东南亚各地访问宣传

当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之时，东南亚上空也笼罩着战争的阴云。东南亚人民，尤其是华侨对中国抗日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动员当地人民帮助中国抗战，实际上也是为了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点燃新的战火，回族人士又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宣传活动。

该代表团由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一行三人组成，他们于1939 年 12 月从香港出发，先抵达新加坡，受到当地穆斯林社团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散发了《中国之回教》图片册，里面用大量照

片揭穿了日寇暴行，介绍了中国回族的抗战热情。代表团先后去新加坡28个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进行宣传活动，不久又在旧王宫举行了南洋回教救济中国难民委员会会议，马天英、吴建勋向到会的各界领袖作了演讲。

自1940年1月至8月，代表团又用六个来月时间走访了马来亚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吉隆坡、怡保、槟城、丁加奴等大小93处市镇，随后又按计划访问了文莱、沙捞越等地。

代表团的来访，引起了东南亚穆斯林的极大关注。不久，他们亦组织起东南亚回教赴华亲善访华团，前往中国桂、滇、湘、黔、川、陕、甘、宁、青等省进行参观慰问。

除以上爱国团体外，还有西北回胞朝觐团及留埃学生朝觐团在麦加的爱国宣传活动。由甘、宁、青等省一百余人组成的西北回胞朝觐团本来是抱着宗教热忱去完成穆斯林功课的，但形势的需要和对祖国的忠诚又促使他们担当起了抗日宣传队的任务。在麦加，他们不仅与日伪派去的朝觐团展开了斗争，而且他们的代表还在一个有15万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言，揭露日寇试图利用穆斯林感情搞欺骗的卑劣行为。留埃学生朝觐团是在收到中国回教协会达浦生、马松亭等人急电，要求全体留埃学生立即组织中国回教朝觐团前往麦加开展爱国宣传，并严密监视日伪派去的朝觐团活动的要求而组成的。这个朝觐团由28名中国留埃学生组成，以庞士谦、马坚为领队。朝觐团的宣传活动在开往麦加的轮船上就开始了，到了麦加，他们又到各国朝觐者中去做工作。团员赵俊复还用阿拉伯文写成小册子，斥责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并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形，深受读者欢迎。日伪派来的朝觐团也来到麦加，他们带着礼品，准备趁朝觐之机拉关系，送礼名单包括沙特、埃及、土耳其许多朝野要人。留埃学生与伪朝觐团展开了交锋。在正气凛然的爱国学生面前，伪朝觐团被迫交代了来麦加

的任务和行动计划。他们承认为这次行动，日寇拿出了1.5万元，叫他们借朝觐散布为敌张目的言论。接着，中国留学生集体晋谒沙特国王，由马坚诵读贺词，并说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的立场。伪朝觐团的成员虽也跟随接见，但只是尾随其后，不敢暴露身份，他们所带来的礼品，被中国留学生以中国朝觐团名义转送国王。这样，日伪借朝觐活动进行反抗日宣传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①

---

① 以上内容参考余振贵：《抗战前期大后方回族人士的爱国外交活动》，载《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第四章

西北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

第一节　新疆各族民众对抗战的贡献

一、成为抗日战争西北大动脉的新疆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腹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复杂，周边从东北到西南与外蒙古、前苏联、阿富汗、印度等国为邻。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的国际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初期，中国沿海地区及腹地先后被日军占领，西北和西南遂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其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着其他省区无法取代的重要位置。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日两国，在他们征服世界、称霸全球的狂妄野心里，都不约而同的将中国西部的新疆视为战略要地之一。1942 年签定的《德意日军事协定》中确定以东经 70 度为界，划分各国战区，并且要让德军在新疆同日军会师。① 实际上，早在这之前，日本就不断派人赴新疆从事间谍活动，为他妄

① 〔美〕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第 107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 年。